

DOI:10.16624/j.cnki.11-3844/d.2022.06.013

胡乔木与新中国史研究事业

周进



胡乔木

胡乔木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思想理论宣传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十分重视学习、研究、宣传新中国史，积极倡导和推动新中国史研

究，为新中国史研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开创新中国史研究工作，
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

195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30

周年，胡乔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承担了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任务。他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础上，把中国共产党前30年的历史进行了新的阶段划分，即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个阶段，从而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前30年历史的基本框架。其中，虽然把新中国成立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为一个部分整体叙述，但是新中国成立的篇幅与其他历史时期是并重甚至是更重的。胡乔木深刻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及其伟大意义，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党对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基本政策”到全国除台湾外“都解放了”，从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把“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观点”“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共同纲领》，从新中国的成立“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欢呼”到“立即进行巨大的工作来恢复和改造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战争和灾荒所重重损害的经济”“在全国施行土地改革”，再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的正义斗争”。这部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来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30年历史的第一本简明党史”，也第一次明确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两年历史，明确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对中华民族、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意义。这充分彰显了胡乔木“善于驾驭史料和能够以概括的语言抓住历史的脉络的本领”。

这部著作于1951年6月底先后由《人民日报》发表和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党史、新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中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两次被教育部指定为高校党史课教材代用本和毛泽东著作讲授提纲，还被译为多种外文向国外发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研究、新中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开篇之作。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出版后，胡乔木虚怀若谷，不断吸纳修改意见，对其继续进行补充和完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业待兴。1977年11月被中央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之后，胡乔木立即投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高学术机构的创建工作中。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的规划，设想用八年的时间成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在内的五六十个研究所。对胡乔木的这个计划，邓小平在1978年3月28日同他、邓力群谈话时表示赞成，要他们写报告，并说：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就可以动起来了。有些事情要赶快立庙，有些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年纪已经大了，如不赶快立庙，过几年立起庙，菩萨也请不到了。老人没有了，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再了解。

在组建研究所时，胡乔木筹划成立了现代史研究室（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为了把科研搞上去，胡乔木除了拟订规划、进行宏观指导外，还具体地考虑重要选题研究，提出了“几个外国研究中国的现状”等12个重要科研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新中国与帝国主义”“人民中国外交史”“中国与第三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的社会主义科学与技术”“论社会主义法制”等100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选题，提出“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并对编写国史提出了指导意见。这些规划和指导，对于开创包括新中国史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是对新中国成立30年历史进行总结的机会。6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一篇讲话，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历史，对30年历史作基本总结，对“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重要问题作出一定的具有总结性的说明。对此，邓小平提出，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内容，要能讲出新水平。这篇讲话的起草在中央常委直接领导下进行，

具体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胡乔木随即组成了一个15人的起草小组，并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主持讲话的起草工作。经过反复修改，讲话在9月27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讲话共分“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三部分，关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30年历史的分段和评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道路等问题都作了不少新的阐述，对于廓清思想认识、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发挥了重要作用。叶剑英国庆讲话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但同时大家又感到不满足，期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问题作全面结论。

为了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深刻揭示并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在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的主持下，胡乔木具体负责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79年叶剑英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后即着手准备，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经一年零八个月得以完成。胡乔木根据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的基本精神，带领起草小组，从决议起草稿的初步设想开始，征求意见，集中党内讨论的意见，反复研讨、修改，直至定稿。在此期间，胡乔木仅同起草小组的谈话就达32次之多，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为写好历史决议可谓呕心沥血。为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他认真研究党史上的重大问题，特别是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深刻揭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创立和制定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概括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中，胡乔木提出：“决不能把阶级斗争看做是比生产力的发展更为根本的动力”，“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拓荒研究。他主张要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开创“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作出概括。起草小组随后将这一道路的内涵概括为十个“主要点”。邓小平对此评价说：“十条基本经验很重要，可以给人以信心。”

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胡乔木还主张在研究新中国史时要处理好党与国家的关系。他指出：“《历史决议》里讲到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有一部分讲到党和国家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应该确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该给它明确的规定，不能给它笼统的规定。”这些原则和理念在他之后指导国史研究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和发展。

倡议“修一部大部头的、完整的现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从事和指导党史和新中国史研究、编纂和宣传工作，是胡乔木毕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充分运用在思想宣传战线上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带着对若干党史问题、新中国史问题的长期思考与深邃认识，积极领导和推动党史研究机构的创建、党史基本著作和新中国史著作的编撰等工作。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并在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中央党史研究室，胡乔木担任编审委员会成员、中央党史研究室首任主任。1982年，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下设党史工作小组，胡乔木亦为成员之一。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后，系统研究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条件已经成熟。1982年5月，胡乔木在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时，倡议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进行研究，编写若干部专著。他指出，这不仅是为新中国历史研究积累资料，而且可以从中探究规律，指导我们的工作。为落实这一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所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出方案，准备编写出版《当代中国》大型丛书。中央宣传部部务会议决定积极贯彻胡乔木的这项倡议，立即着手组织落实，于同年11月向中央作了报告。当月，中央书记处即讨论通过了由胡乔木倡议、中

宣部提出的《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

此后，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出版署等部门组织全面启动《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出版工作，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和省、市、自治区党委收到报告后立即着手组织力量开展这项编写工作。在1983年2月召开的《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会议上，胡乔木指出，“丛书要记录的事实，要总结的经验，主要不是政治方面的，而是各部门业务本身的发展，本身的成就，本身的经验。”“我们不做这些工作，对不起过去的人，对不起现在的人，也对不起将来的人。”“按人口来说，中国在上世界上将近占到四分之一。这样一个大的国家三十多年的历史，没有叙述，没有系统的报道，却流传着种种的奇谈怪论，如果我们不起来加以纠正，把中国的真相告诉世界的人民，这就是我们的错误。”“我们现在是三十二年，书写起来，大概至少到三十四年，也许到三十五年，才能分门别类地写出。这样的书如果各个部门都能陆续地编写成功并出版，那末，我们就有可能修一部大部头的、完整的现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关于编写这套丛书的重要价值，他认为，不仅“可以记录下我们的干部、群众所做的斗争，记录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使人民了解今天中国来之不易，也给后人一种榜样”，“还可以把中国的发展变化报告给全世界”，

“又可以为干部教育提供教材”，“还能将来进一步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

在胡乔木的指导和推动下，广大新中国史研究者和出版工作者先后有10万多人投入到我国第一套全面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大型丛书的编撰出版工作中。《当代中国》丛书自1983年全面启动至1999年全部完成，共出版152卷、212册，1亿字，3万幅图片。1999年6月30日，《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讲话指出，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正如胡乔木所指出的，《当代中国》丛书，为我们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经验和规律，为广大干部群众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生动的教材，为资政育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这套丛书在编写史书尤其是编写新中国史著作的方法和体例上都有开创性意义。在编写方法方面，按系统、部门、地区来全面组织编写史书，而且各卷由现任或退居二线的领导担任主编，吸收各方面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参与编写，这在中外史书编写工作中实属罕见。在编写体例方面，采用章节体

例和纵横结合的写法，融汇了编年、通志、纪事本末、专题等中国史书传统编写体例和现代编写体例。在各卷内容设置方面，开篇均为绪论或“历史概说”之类的篇章，概要阐述旧中国与各自部门或地区有关的情况，可视为该部门、该行业、该地区解放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过程及经验教训，继而分述各方面的状况。以地方卷为例，分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各方面、各行业发展的历史，有些地方卷还用一定的篇幅记述本地区所属市、地区的概况。这些开创之举为今后党史、新中国史编写工作确立了可供遵循的范例。

丛书各卷编写人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可靠的材料，客观撰写本部门、本行业、本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设史、发展史，旨在总结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的经验教训，认识和把握规律。不少研究还填补了空白，如《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当代中国核工业》《当代中国海军》等分别对新中国的航天工业、核工业和海军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克服种种艰辛而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第一次作了全面、生动的叙述。这些著作一经出版，广受追捧，读了令世人欢欣鼓舞。

这套丛书是我国第一套全面记录新中国历史的规模空前的丛书，也是一部科学的信史。胡乔木虽然在有生之年未能见到这套丛书的最终完成，但他在新

中国史研究、编纂方面的开创之功永载史册。

推动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 统筹全国新中国史研究工作

在推动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同时，胡乔木又积极推动筹建新中国史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89年11月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胡乔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了。我们应当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研究，编写共和国的历史。”他提出先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计划编到1989年，并分析了开展这项任务的基础和条件，就分期问题具体地谈了有关设想。为顺利开展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胡乔木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内部也进行了协商沟通。他提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一方面组织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另一方面为将来成立国史馆作准备。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胡乔木多次就筹建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具体事宜与邓力群交流。他在给邓力群的信中说：“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确实开张营业的时间，以及能立即专门着手调查研究整理资料部署工作的专职人员的调集就位，希望能早日决定了。而且还需要向中央、国务院正式报告请示。我常想，这一辈子实在没有做什么工作，

今后也做不了什么，有些早该做而未做的事现在得抓紧些，否则后悔自责晚矣。”

1990年6月14日，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胡乔木等联名给中央提交报告，提出：“我国建国已40余年，建国以来的历史已占党的历史的大部分。而至今对于建国以来国家和党的历史的研究工作都极为薄弱，亟须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予以加强。”“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工作，由邓力群同志负责组建和指导较为适宜。”6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分别圈阅同意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并任命邓力群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由邓力群同志代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在政治上指导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至此，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式成立。新中国从此有了正式的专门从事研究、编纂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搜集和编辑有关新中国史资料，参与新中国史的宣传与教育，联系与协调各地区、各部门新中国史研究工作的机构。

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后，积极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和健全新中国史研究机构、筹备成立国史学会、开展全国百家大中型企业调查、继续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等。1990年12月，当代中国研究所在陕西西安主办“中华人民



1990年11月25日，胡乔木在珠海拱北宾馆写日记

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199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转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纪要〉的通知》。《通知》说：“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纪要》转发给你们。写出一部符合实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必须依靠全国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请你们给予积极支持。”《纪要》提出：“开展当代中国史的研究，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必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不仅是一项适应形势需要的迫切的政治任务，而且是一桩具有长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建

树。”《纪要》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所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工作，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负责联系与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的召开和《纪要》的转发，不仅明确了当代中国研究所负有联系和协调全国开展新中国史研究的职责，更开启了从中央到地方全面统筹推动新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

这项由胡乔木开创和奠基的新中国史研究事业，从此与新中国同行共进，不断推出新中国史研究的权威著作成果，如2012年出版的五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2016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丛书》（2019年增订再版）、2019年出版的《新中国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2021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等。这些著作成果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全景呈现伟大飞跃的光辉历程，集中展现跨越发展的伟大奇迹，深刻揭示历史变革的宝贵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学理支撑和强大精神动力。这些著作成果深刻彰显了胡乔木等领导同志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赋予的“修史、资政、育人、护国”职责使命。

总结历史经验，探究发展规律， 努力形成中国学派

胡乔木对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一直

怀有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他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新思考，产生了一系列有深度、有新意、有价值、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论述，推动了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事业的创新发展。

199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篇“提纲式的论文”中，胡乔木站在总结党的70年历史的高度，从12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重要发展和贡献，提出了“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八十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改革开放事业是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真正的续篇”的论断。他把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积极成果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并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向深入的新思路，强调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水平和学术水平，“形成中国学派”，可谓精辟独到，意义深远。

关于为党和国家修史的战斗性和科学性，胡乔木认为，党史工作不应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而是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我们的党史工作要科学地论证我们党和人民所走过的这条道路，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客观趋势的，如果过去采取其他的发展道

路，不可能有中国今天的一切。如果今天走其他的道路，中国只能出现大混乱、大倒退。”他主张，历史唯物主义要求非常仔细地、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研究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不能仅从会议、文件出发，而要从历史实际出发，把握基本史实，理清历史脉络，用史实来说明问题。看待历史不能简单化，不是像贴标签那样，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庸俗化。

关于编写党史、新中国史的根本立场和方法，胡乔木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同样适用于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和改革的新中国历史。胡乔木强调编写党史时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人民群众要求，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二是要表现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在党史中也应当有自己的地位；三是既要写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活动，还要写党的地方组织、党的优秀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活动。在写作中，胡乔木提出了“四面八方”原则，即“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写党史必须要写人民群众、写朋友、写地方和普通干部和党员，要阐明党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他还提出，写党史要表现我们的满腔热情，革命经验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鲜血换来的，要带着感情恰当地进行评论，不能用平淡无奇的笔法，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来写。

历史不仅是简单的记事，要把抽象的事实、具体的事实和事实背景三者搭配好，还要有许多名言轶事，有人物描写，既要写大人物，也要写小人物，要像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那样写得脍炙人口。这些思考、观点体现了他始终牢记党史、新中国史研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对党和国家事业满腔忠诚的炽热情怀、对人民饱含深情的为民情怀。

胡乔木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于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事业，对于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中国学派，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胡乔木的一生把为党服务、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作为最大光荣，勤勤恳恳、尽心尽力、饱含深情，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正如杨尚昆所评价的：“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期望，都已经流泻在他毕生写作的不计其数的文字之中了。这些文字写上他个人名字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的的是用了党和国家的名义。他个人已经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终生用笔为人民服务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地”。（责任编辑姚建萍）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